

社會福利計劃模型的分析

□林萬億□

從民國四十二年開始實施第一期四年經濟計劃，到目前，我們已完成了五個半的四年計劃，接着進入第一個六年計劃，今年又開始執行十年經建計劃。這些「計劃」的概念，經常出現在報章雜誌上，在耳濡目染之餘，讀者對於另一個術語，即所謂的「社會計劃」，想必較能即刻接受。

回顧過去一、二十年來，有關於社會計劃的字眼，在國民的記憶中，並不多見。五十七年臺灣地區實施家庭計劃；六十一年秋，臺灣省政府推行「小康計劃」，消滅貧窮運動；同年冬，臺北市政府也推動「臺北市貧民安康計劃」。這些算是較著名的社會計劃，但都是為特定目標的計劃，真正的媲美於經濟設計計劃者，從未有聞；最近報載政府有關單位已研擬完成「中華民國臺灣社會福利建設十年計劃」（中國時報六十九年三月十日），決定在今後十年中動支新臺幣四百四十二億，積極辦理國民保健，擴大社會保險範圍，改善社會救助、增設社會服務設施、增強文化建設等措施。若此，則社會福利計劃的推動在未來的國家發展上，勢必佔上一席之地，從事社會福利工作的人們，不論是私人機構或是公家機構，不論是地方或是中央單位，對於社會福利計劃的認識與研討，是不可或緩的。

壹、社會福利計劃的基本觀念

要了解社會福利計劃之前，讓我們先知道什麼是計劃 (planning)。Melvin Weber 認為「計劃」是根據社會反應其內含價值，對未來的目標及行動從事理性抉擇的過程。另 N. Gilbert & H. Specht 在其「社會福利計劃」(planning for Social welfare) 一書中，也說道：計劃是藉著推測、系統思考、調查，以及在行動選擇上進行價值的抉擇，而有目的地企圖解決問題和對未來事件進展的控制。所以計劃也被解釋成「一種理性的重組過程」。

至於什麼是「社會計劃」(social planning)？簡單地說，社會計劃是經過選擇及合理化 (rationalization) 來制定社會政策，並使此政策得以實現。換句話說，社會計劃就是社會政策的選擇及根據事實現象、設計 (projection)、價值意義，來做一個社會方案 (program)。(陳謨倫：一九七五：二五)

嚴格地說來，經濟計劃也是社會計劃之一部分，在整個大社會體系之內，經濟制度是社會制度的一種。這樣的觀點之下，社會計劃是相當廣泛的。

目前，我們習慣的用法是將社會計劃狹義地認定，平行於經濟計劃，我們寧願說它是「社會福利計劃」。一般綜合性的經濟建設計劃都會將社會福利列入一個部門，從福利經濟的觀點來看，是必需的；但就完整的社會福利觀點來看，一套具體的社會福利計劃是有必要的。

計劃是一種專門而複雜的活動過程，在我們的生活圈子裏，幾乎任何事件的進行，都可以算是某種形式的計劃。社會計劃提供一套系統化的作為，試圖修正過去社會服務活動與社會福利機構未能有計劃的配合，所產生的一大堆不滿、缺乏效果與效率，和對社會問題反應的遲鈍等缺失，所以社會計劃也是一種干預的方法，而只是更有系統地來達成目標而已。

過去，社會計劃並不被重視，一些計劃者，從事的大多是都市區域環境的發展，近年來才逐漸地涉及更廣泛的經濟、社會層面，朝向所謂「綜合性計劃」(comprehensive planning)，不再只是注重環境生物的設計。計劃的根源最早是來自城市計劃，十九世紀末期，逐漸地加入土地利用，都市發展的觀念，但是仍然只強調物理環境的發展。到了美國新政 (New Deal) 之後，才進一步有社會、

經濟的計劃。而可以發現計劃在經濟上的運用先於社會福利，從歷史發展來看，計劃被引進社會福利或社會服務，首先是在社區組織上，通常我們都習慣於將社會計劃與社區組織兩個術語放在一塊兒。

社會福利計劃這個名詞是近幾年才被廣泛地採用，追溯其歷史淵源，大概受到十九世紀慈善組織會社 (The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ies) 以及社區改良 (Settlement reform) 兩項運動的影響。社會福利工作自一九三〇年代以來，美國私人機構的社會服務逐漸轉向政府的公共福利部門，聯邦政府負起更多的社會福利責任，從地方的社區基金方案，到聯邦的社會福利方案，社會福利計劃機構普遍設立。社會福利計劃單位成長很快，使它在社會工作中的角色日益重要，而且非常專門，它被運用在社會工作中私人機構與公家機構。社會工作大量採用計劃的概念，已使社會工作的功能擴大而複雜化。社會工作在國家發展上的重要性也日趨確立，尤其是綜合性計劃的採行，社會福利計劃已擔負起社會均衡發展的重要角色。

貳、社會福利計劃模型

前面我們已提到社會福利計劃是一種系統化和有秩序地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所謂系統化是指計劃者必須在許多可選擇的範圍內摘取最優先的方法，以達成目標；有秩序是因一個計劃通常透過很多活動才能達成，所有要有邏輯上的關連順序，所以計劃本身帶有理性和分析的涵意，是一種藉系統的

步驟，目的在於達成社會目標，所採行的社會干預過程。(L. Armand 1978:71)

無疑的，社會福利計劃是一種過程，大多數的社會福利計劃文章中，都從兩個觀點來描述與分析計劃過程，一端是技術方法的過程；另一端是社會政治的過程，計劃者經常兼具兩個角色的糾葛。技術方法過程的一面，所指的是「分析」的職責；社會政治的過程所指的是「互動」的任務。分析的職責包括資料收集、問題的評定、優先順序的排列、目標的確立、方案設計、以及成本效益的推估等；互動的任務指的是計劃決策中計劃體系的建構、促進溝通、議價、以及黨派間的利益交換等。

從這樣的分析職責與互動任務的連續體上來找尋，計劃的技術專家 (Technocrat) 的位置傾向於分析的一端；計劃的倡導者 (advocate) 則在互動的一端；而官僚行政者正好居於兩者之間。

區別分析與互動任務的運用，不只在區別計劃者的角色，而且可以區分出計劃過程中的一般模型，在這裏我們以四種計劃模型來分析比較，這四個模型即(1)理性決策過程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2)混合掃描 (Mixed Scanning)，(3)無系統的增殖論 (Disjoined Incrementalism)，(4)交流計劃 (Transactive Planning)。

一、理性的決策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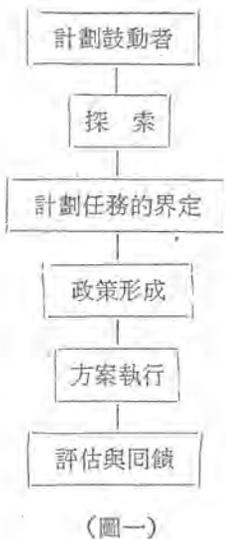
計劃是一種發展性的過程，各階段不斷地交互影響，雖然可以列出一個邏輯推理的順序，但每一

階段不是獨立自存的，而是相互依存，形成一種連鎖的螺旋體和循環序列，在一部份變遷將影響到整個體系的發展。

由於每一專家對過程重視程度的差異，以及所用術語的不同，一套理性的計劃過程在每個人的描述下，都有所差異。首先，我們以 Alfred J. Kahn 的模型來分析：

Kahn 強調的是任務的界定 (Definition of planning task)，他說：計劃者最嚴肅的決定和主要的貢獻也就在於「計劃任務的陳述或界定」，而任務的陳述是將一致性的計劃執行與需求結合在一起。所謂需求，指的是社會事實和社區偏好，計劃的任務界定表現在這兩個元素間的統合，任何計劃都由此統合而產生。

Kahn 將其計劃的過程簡單地摘要成一錯點圖 (如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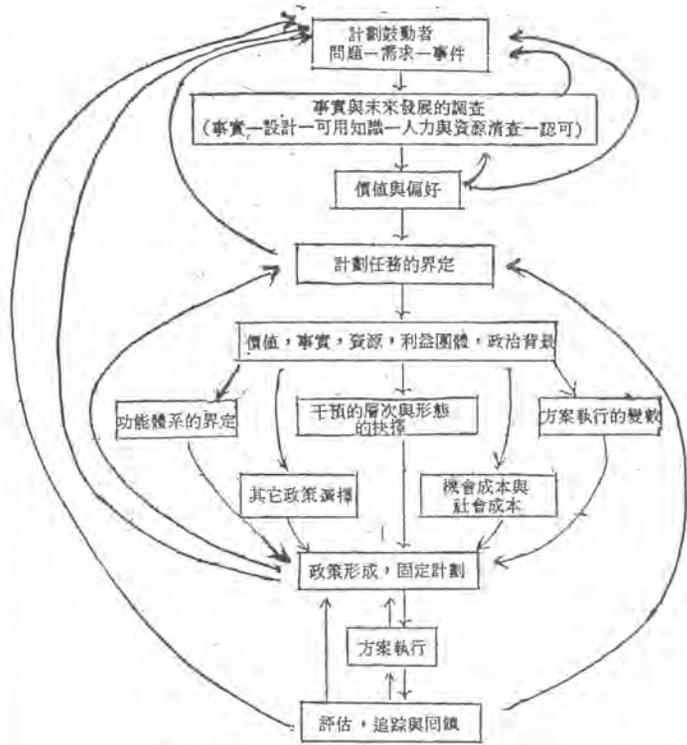


(圖一)

由這個簡圖，可以發展出一套相互扣連的循環體，每一階段有其特定的任務，任務間不但相互關連展現，而且相互修正成一螺旋狀關係體系，讓我們以圖二來加以進一步說明：

Kahn 認為一般人容易犯的毛病是將社會當成靜態的，雖然，他們也是將目標在計劃前加以說明，而且也是在滿足需求，但是對於需求的界定則會有很大的出入，也就是如何將現實的需要與計劃的理想結合在一起，就得靠一連串分析的過程。

在計劃任務的界定上，要從事實之搜集與分析，事實包括現實的問題，相關基本資料，以及事實對未來發展的影響；接着還要分析各項資源，包括財力、人力與知識；進一步要探討社會價值與人



(圖二)

民的偏好，以及人們對問題的認識程度，這些都成為界定任務的基礎，而不能只憑臆測或想像，一定要具體而微地加以搜羅分析。

計劃任務決定之後，進一步要形成政策，也就是所謂的制定政策，要形成一套可行且有效的政策，以達成社會目標，要將一些因素加以考慮，也就是由價值、事實、資源、利益團體、政治環境所形成的一個網絡，進一步落實到可行的方案上。我們要考慮與本計劃相關機構的聯屬關係，將推行本計

劃的機構視為一功能體系，且一一界定其功能範圍；我們還要決定到底用何種方法來執行，干預這個目標要到何種層次；我們也要了解本計劃在整個社會中的地位，是否有相關計劃，或是相隸屬的計劃；接着我們要在許多方案中選擇可行的且有效的方案，可能在這個情境內有許多相斥或相依的方案，但理性的抉擇是有必要的。

綜合 Kahn 對事實、計劃和細目 (facts, projections & inventories) 的看法，有以下要點：

- (1) 詳細地界定問題。
 - (2) 診斷原因。
 - (3) 尋求相關理論。
 - (4) 對範圍與等級進行實際的推估。
 - (5) 考慮構成要素間的關係。
 - (6) 投入相關的變數。
 - (7) 清查現在及未來資源。
 - (8) 計算目前可用的與潛在人力。
 - (9) 檢具相關法條，認可與尋求先例。
 - (10) 轉換所有因素進入時間、空間單位，或依其他標準來區分。
- (1) 組合其他依事實所做的說明，並加以評估。
(2) 估計各種可能干預的結果。(A.J. Kahn: 1969: 60-71)

前面我們已經提過 Kahn 所強調的是計劃任務的界定，當計劃形成了之後，要使計劃逐行且加以評

估，在執行前要注意方案介紹與推廣，這個工作包括寫計劃書、考慮向誰介紹、宣傳方式等（陳藹倫，一九七五：二六）。在計劃執行階段，則要考慮工作的協調，如行政上的協調，以及服務計劃間的協調；並且要有儲備與訓練適用人才，方能推展順利；經費的籌措、分配、使用，也要詳加編訂；接着如何使計劃有實用價值，進行效用與效率的分析是有用的；任何一個計劃，有關係的任一方均能獲得了解，且提供積極的參與，是計劃推行的助力，所以有效地宣傳是不能疏忽的（李東江，一九七五，一一—一二）。除了最後一階段所進行的評估之外，每一計劃進行階段都應該而且必須做自我考評，詹火生教授將之列為第一層次之計劃評估與執行之評估，以及計劃結果之評估，每一階段的評估都能對進行中的計劃過程產生修正或肯定。

當然，計劃是一個無終止的過程，本計劃完成目標之後，入檔將成爲下一個計劃的參考文獻，或將對其他相關計劃提供比較的標準。從以上的敘述，讀者大概可以獲得一個計劃過程的具體印象。接着，讓我們談一談另一個模型。

二、混合掃描的途徑 (Mixed scanning)

這個決策的途徑，被稱爲第三途徑 (A Third approach)，第一途徑指的是前面所提過的理性決策過程；第二途徑，是下一節會談到的無系統的增殖論。這個主張是由 Amitai Etzioni (1967: 385-92) 所提出。他認爲理性的模型假定決策者的掌握高於決策情境，增殖論者的途徑，則代表一種相對立的

模型，它是一種「混過去」(muddling through) 的藝術，假定很少掌握住環境；最後，是這裏所提出的第三途徑，是結合前二者的特性，既不像第一模型那樣理想化，也不像第二模型那般保守。

理性模型的一般概念是「如何決策」和「什麼應該做」，一個行動者了解問題，假定目標，謹慎地選定方法，依照估計出的各種優劣比較而選擇。增殖論者主要認爲模型的需求和決策者的能力之間不一致，社會經常無法提供一套特定且一致的價值標準來做爲抉擇的評估依據，價值本身是不穩定的，在決策形成中不但受到影響，而且也影響決策。

增殖論者的途徑認爲決策者的能力有限，爲了減少資料蒐集和計算的範圍與成本，而提出六個基本條件：

- (1) 決策者的焦點僅在於考量既存的所有政策之利益差別，而不是努力去對所有可選擇的政策做綜合性的調查與評估。
- (2) 僅有相對地少數政策選擇被考慮。
- (3) 每一個政策選擇，僅對有限的重要結論做評價。
- (4) 碰到問題時，決策者不斷地再界定，即目的——手段，手段——目的之間不斷地調適，總之，是在使問題更能掌握。
- (5) 如此，雖然沒有下一個決定或正確的解決。但是，在手邊的每一問題，透過一連串的分析 and 評估，達到不斷的处理。
- (6) 因此，增殖着的決策像一種補救式的，在於對不完美的社會現象進行緩和與穩固的工作，較少

促進未來社會的目標。

混合掃描 (mixed scanning) 所描述的策略包含兩者，一是實施上有很大的變化，二是產生有效的結果。舉例來說，假定我們欲藉氣象衛星建立一個泛世界的氣象觀察體系，理性模型會藉着攝影機以及天候狀況趨勢表來徹底調查氣象條件，這將掉入瑣碎的資料堆中，繁重的分析工作可能埋沒了我們的工作能力。增殖論的焦點放在最近一些相同發展模式的地區，也許，只是鄰近的區域，它必然忽視一些發生在意料之外，而值得注意的地區之資料。

混合掃描的策略包括兩個途徑的要素，它使用兩個攝影機，一個是廣角攝影，它能涵蓋天空中各個角落，但是不很細膩的；第二個攝影機是狹角攝影，呈現出的地區比第一個攝影機要求得有深度。

從理論的觀點來看，混合掃描提供了一套資料收集的特殊程序，資源分配的策略，以及兩者關係的指針。這個途徑結合了細部（理性的）掃描的一些扇形區，而不是對整個區域做窮盡的掃描。掃描可以區分爲二個層次以上，依照明細與涵蓋範圍的程度分爲若干層次。通常可以將決策分爲兩個類屬，一個基本重要決策，一個屬於增殖決策的範圍，增殖決策由基本重要決策中引出。在混合掃描中，兩種途徑之任一均有助於減少因另一元素短缺時所造成的影響，增殖論者藉着對細部要求的限制，而減少重要決策的空洞層面；而理性主義協助克服增殖論者在長程抉擇上的保守。

三、無系統的增殖論 (Disjointed Incrementalism)

C.E. Lindblom 發展出這個決策模型，它相對於集權社會的支配計劃，而代表着一種多元化社會下的決策過程，他受到自由競爭經濟模型的影響，增殖論者反對政策能由表現一種社會集體善意的中央制度所引導的理念。政策無寧說是社會上無數的黨派間互惠 (take and give) 的產物，一個好的決策是取得決策羣的同意；一個差勁的決策，則是指被排除在活動設計進度中能力所及之外的，因此，這類的決策是趨向於不斷阻擾也不斷修正。(A. Etzioni 1967:387)

Lindblom 說道：假如給一個行政者制訂一個政策的任務，他首先會嘗試列出所有相關的重要數值；其次，他可能要提出可能政策的選擇；第三步，他會系統地比較那一個決定是最有利的；最後，他會選擇最大值的策略。這就是理性決策的一般模式，它靠着操作研究 (operations research)，統計決策理論 (statistical decision theory)，以及系統分析 (system analysis) 來加強，在理性決策過程中，要有明確的目標，明細的評估，高度的綜合觀點，以及盡可能用數理分析將價值量化。所以它必須有足够的知識能力和有關資源的訊息，甚至於要擁有足够的金錢與時間。

前面我們會提到增殖論是可以從理性決策中衍生出來，因此，理性決策可以說是一種根本的方法 (root method)，而增殖決策則是分支的方法 (branch method)，它是透過不斷界定的比較 (successive limited comparisons) 以達成決策的運作。總括此種決策途徑有以下要點：

(1) 價值目標的抉擇和需求行動的實徵分析並非相互區分，而是交互糾纏在一起；許多複雜的問題、目標、價值並非很清楚地確立着，在政策上的抉擇相當困難。有時，人民不同意；有時議會不通過；偶而行政單位也有滯碍難行的。例如垃圾處理方案，或社區活動中心設立方案等，利益的趨避是很重要的因素。尤其是當行政者有所偏好時；或者大眾傳播系統，或議會未提出強烈的要求或討論時，增殖決策者就不會去激發這樣的計劃，也就是一個被顯著化的政策，就不容易被抉擇。可以說，行不恣揮通常以自己的價值來衡量，安排某些價值選擇的先後順序。

(2) 目的與手段的關係：手段與目的之間難以區分，所以手段與目的的分析總是受到限制和不適當的。兩者的關係不經過評估後才做選擇，而是一種價值同意的延伸，但求調和與穩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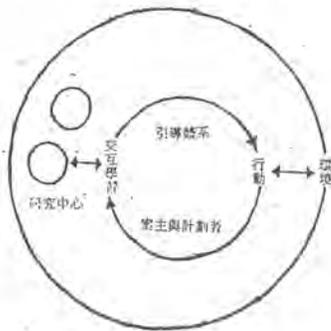
(3) 好的政策立基於同意：好的政策是因其被同意而推行，而不是政策本身的正確、合理、或完美。政策的選擇，目標本身並不是最後的有效性，同意才是最好的政策的檢定標準。

(4) 分析被限制：重要的如可能產出量或潛在政策均被忽視，影響力也被忽視。因為決策者相信人

類智慧有限，一個人無法以理性而綜合的方法來處理複雜的問題，決策者面對複雜的問題時，均希望加以單純化。簡化的焦點在於從現有的政策去比較，但決策並非反覆無常地簡化，而是增殖地選擇。不斷地界定比較，有兩個方法可以達成決策選擇的簡化：一、是限制政策的比較範圍在現有政策的差異上，而且使可比較的選擇成爲相對地少數，如此可以減少一些明顯的矛盾；二、是不需要對政策進行全面的查詢，只要研究其結果的差異即可。

(5) 不斷地比較：每一個決策者只就目前自己所能地考慮這一步可能產生的結果，不必去做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長遠判斷，決策者努力使下一步能持續下去。然後，他也努力去修正進行中的各階段之偏誤。(C.E. Lindblom 1959:79-88)

增殖論者相信，爲了達到綜合性的考量而忽略了人類能力的限制，這個途徑要比理性決策的徒勞



- | | |
|---|---|
| <p>計劃者的貢獻</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概念 • 理論 • 分析 • 處理的知識 • 新的構思 • 系統的執行過程 | <p>策主的貢獻</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事件相關的區區知識 • 現實的抉擇 • 規範 • 優先順序 • 可行性的判斷 • 操作的細節 |
|---|---|

(圖三：交流計劃模型)

無功要確實多了。

四、交流途徑 (Transactive approach)

由於設計專家與案主之間不斷增加的隔閡，如何使案主與計劃者之間的差距被填補，是這個途徑的主要期待。John Friedmann (1973:171-90) 強調計劃者與案主之間對話的增加是有必要的，雖然知識背景的不同，使用語言的差異，但是必須去克服它，透過案主與計劃者的交互學習，而決策得以完成，最主要是西方要開放地建立人際關係，此種模型傾向道家的「無為」思想，所謂「為無為，則無不治」。我們以圖三來表示這個模型（請見上頁）。

叁、各種模型的比較分析

讓我們再描述一下各個模型的要點，再進一步做比較，理性模型並非不曉得計劃的社會政治層面 (sociopolitical aspects)，而是他們更注重事實的收集，相關事實的鑑定等技術性的功能。混合掃描是結合理性模型中所強調的任務分析、事實資料的收集；以及增殖模型中所強調的共識建立的互動任務。他結合了兩個活動的層次，一個是廣角掃描 (broad-angle scanning)，從事資料的收集和分折（但不像理性決策那樣仔細）；另一個是狹角掃描 (narrow-scope scanning)，從事小範圍的詳細檢視（類似於增殖探究），也就是計劃活動粗略的方向所需的資料來自廣角掃描，而在內容上則採用特殊和增殖的選定。

無系統的增殖論是從已有的政策中及已界定的選擇範圍內去做選擇，不像理性途徑，這個模型不強調問題解決的深度因果分析和全盤的行程檢視。在有限的範圍內比較「那個是」，在變遷的方法上「那個是可接受或可行的」。所謂「完美的」(best) 方案不被強調，而決策者只管在這些選擇的範圍之內，那個方案被利益團體所同意，它就是「好的」(good)，在這個途徑中，互動的任務被優先強調，如政治交換、妥協和同意的達成等技巧。

交流途徑視計劃為一個社會過程，計劃不只是一個計劃制訂的活動，而也在於引導繼續的變遷，它的目標和工具是不斷地在調適，它不像理性決策將問題分析、設計和執行分成好幾個階段，而是將分析和行動兩個主要元素整合為單一的過程，分析與行動的溶合要靠計劃者與案主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確立開放的對話和交互學習。

現在，讓我們就四種模型的假設、有關共識的達成以及計劃集權和分權的程度加以分析比較：

(1) 理性決策途徑假定社會在手段和目的上均可達到某種程度的共識，設計一個完美的計劃是技術的問題，只要靠著對相關資料仔細的分析即可解決。分析要更有效和有效率得靠中央計劃機構，才能處理大範圍的計劃，而不是一個分權單位所能勝任的。

(2) 綜合掃描容許各種程度的社會共識，如果對任何論題共識的程度很高，則一般政策趨向於集權決定，而特殊方案設計才由分權設計，如擬定人力

訓練方案或職業輔導方案或者農民保險方案應是以中央為妥；而社區發展方案或基層建設方案，由各地方負責設計反而是有利的。

(3) 無系統的增殖論，否定在廣泛的計劃論題中均能建立起共識，因此，共識是極難以達成的。這個模型主張分權機構透過不同的利益團體共同諮詢，這個單位是可以改變的，相當有彈性，這樣的安排等於是容許反對團體保護他們的利益。所以允許計劃的過程中，在社會水平上進行互惠的調適。

(4) 交流模型所假定的計劃過程是小的，分成一個小格局，增加成員間面對面的互動，廣泛的共識在這些小格局中是沒有考慮的必要的。(N. Gilbert & H. Specht 1977:71-74)

肆、適用模型的選擇

面對以上的分析，讀者也許要問，那一種模型最好？那一種模型最適用？這是有肯定的答案的，見仁見智。通常依照計劃者的能力，或者對現實的理解，以及社會的價值；當然計劃的環境有關；計劃的時限；計劃內容的複雜程度均有影響。

進一步的問題要問，在什麼條件之下，各種模型最有效？那就要看待解決的問題是屬於何種程度的複雜性，T. Cartwright (1973:179-187) 發展出一套問題的類型學。依照問題的特性加以分類，他定出四種問題的程度順序，即單純的 (simple)、混合的 (compound)、複雜的 (complex) 和共變問題 (metaproblem)。他認為單純的問題適於

用理性決策途徑；而其變問題適合用無系統的增殖決策或交流途徑；而混合問題或複雜問題，他建議採用混合掃描途徑，依照這樣的分析，計劃者分析與互動任務是一種動態的調適，強調依照問題特性來轉變。

但是，仍然有一些爭議，如 Melvin M. Webber & Horst W. J. Rittel (1973:155-169) 所提出的，他們同意 Cartwright 所指的單純問題的界定，也同意可以採理性的決策途徑；而對於混合和複雜問題經由理性途徑和增殖途徑處理，Rittel & Webber 認為有困難；至於共變問題，他們叫它強烈的問題 (wicked problems)，用理性途徑顯然是不適用的，但是，Rittel & Webber 甚至懷疑增殖的計劃途徑能達成某種程度的同意。

不論如何，在不斷增加異質性的社會結構，Cartwright 對問題的分析，以及各種計劃模型的提出，未嘗不是提示一個方向，而 Rittel & Webber 的建議，為社會計劃指出了一個幽暗的走道，但如何通過就得靠社會福利計劃者去摸索前進了。(N. Gilbert & H. Specht 1977:75-77)

伍、結語

近年來，各項計劃的推行，已使我國現代化建設急速發展，但是硬體 (Hardware) 建設計劃比較有成就，所謂軟體建設，就是指經濟建設、工程建設；而軟體 (Software) 的建設計劃比較之下則感不足，軟體建設就是指政治、社會、教育、文化

方面的建設，主要原因是後者牽涉的變數太多，關係複雜，較難作長期的掌握及規畫 (魏輔，一九七九)。今後在朝向一個「計劃社會」的目標上，如何運用社會福利計劃模型，以及進一步對分析工具、評估方法的了解與採行是有待社會福利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標。

不管何種情況下，採用何種計劃模型，基本上對一套系統化的過程，一定不可不熟稔，即使有時強調分析的任務，但其互動的任務也不可視而無睹，在 R. Perlman & A. Gurin 的信念裏，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同時注重分析與互動是必要的。當然，能以本文的介紹，對讀者認知廣度的擴展，而更能得心應手地處理各種層次的計劃，那將是最大的期待。

參考書目：

- (1) 李東江「泛論社會計劃」，社會建設，25期，民國64年12月，頁3—14。
- (2) 陳謨論「淺談社會計劃」，人與社會，2卷6期，民國64年2月，頁24—26。
- (3) 社論「由計劃經濟到計劃社會的總預算」，聯合報，69年3月7日。
- (4) 魏輔「國家中長程政策計劃的基本觀念與作法」，聯合報，68年10月13日。
- (5) N. Gilbert & H. Specht Planning for Social Welfare: Issues, models, and Tasks, Prentice-Hall, Inc. 1977 New Jersey.

(9) A. I. Kahn "Definition of the Task: facts, projections, and inventorie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planning, 1969 pp. 60-71.

(10) A. Etzioni "mixed-scanning: A "Third" approach to decisionmak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 (December 1967) pp. 385-92.

(11) C.E. Lindblom "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 (Spring 1959) pp. 79-88.

(12) I. Friedmann "The Transactive style of planning" Retracking America: A Theory of Transactive planning, 1973, pp.171-90.

(13) T. J. Cartwright "problems, solutions and strategies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lann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39:3 (May 1973) pp. 179-87.

(14) H. W. J. Rittel & M.M. Webber "Dilemmas in a general Theory of planning" Policy Sciences, 4:2 (June 1973) pp.155-69.

(15) R. Perlman & A. Gurin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lanning 環球書社翻印，年廿一，1975。

(16) A. Lauffer Social planning at the Community level, Prentice-Hall, Inc 1978, New Jersey.